

【历史研究】

周必大的史学贡献

黄惠运

(井冈山大学 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 343009)

〔摘要〕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刻书家。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刻印《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等文献,保存了珍贵史料;创制了一套历史文献考证校勘方法;提出并践行“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史学思想。他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周必大;刻印文献;考证校勘;“实事求是,多闻阙疑”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4)05-0046-05

周必大(1126—1204),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人,祖籍郑州管城。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省斋居士、青原野夫,又号平园老叟。南宋丞相、政治家、文学家、刻书家、历史文献学家。周必大祖父周铎到吉州任职而遭至废陵,又兵祸起而“遇乱,不能北归,遂家焉。”^{〔1〕}父亲周利建,太学博士。母亲王氏“幼善女工,通经史,博知古今事,不自以为能,而孝友柔顺是专。”^{〔2〕}周必大幼年丧父,“母亲督课之”^{〔3〕}更加勤学不倦,在家学的熏陶下打下了扎实的文史知识基础。至周必大时,“庐陵周氏”已然成为名声显赫的望族。绍兴二十一年(1151),25岁的周必大中进士,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二十七年(1157),举博学宏词科,任建康府教授。三十年(1160),召为太学录,召试馆职,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兼国史院编修官。三十二年(1162),除监察御史。孝宗即位,除起居郎,迁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又权给事中。侍经筵,尝论边事,上以蜀为忧,对曰:“蜀民久困,愿诏抚谕,事定宜宽其赋。”应诏上十事,皆切时弊。权给事中,缴驳不辟权幸。翟婉容位官吏转行碍止法,争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金索讲和时旧礼,必大条奏,请正敌国之名,金为之屈。乾道四年(1168),除权发遣南剑州,改提点福建刑狱。入对,愿诏中外举文武之才,区别所长为一籍,藏禁

中,备缓急之用。六年(1170),除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兼领史职。八年(1172),兼权中书舍人。九年(1173),除知建宁府,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孝宗“喜其精洽,欲与之日夕论文。”称赞周必大“此大才也。”奏请重侍从以储将相,增台谏以广耳目,择监司、郡守以补郎官。淳熙元年(1174),除右文殿修撰。二年(1175),除侍讲,兼直学士院,擢兵部侍郎。三年(1176),兼侍读,除吏部侍郎、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上奏皇帝:“愿陛下储才于闲暇之日。”江、湖旱,请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上嘉之。五年(1178),除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周必大在翰苑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七年(1180),迁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除参知政事。九年(1182),除知枢密院事。十一年(1184),除枢密使,创行内外诸军点式法,震慑外敌,安定边防。十四年(1187),迁右丞相。十六年(1189),进左丞相,封许国公。光宗即位,问当世急务,奏用人、求言二事。拜少保、益国公。绍熙元年(1190),除判隆兴府。二年(1191),判潭州。四年(1193),改判隆兴府,复除观文殿学士,判潭州。五年(1194),除醴泉观使。宁宗即位,求直言,周必大奏四事:圣孝,敬天,崇俭,久任。庆元元年(1195),以少傅致仕。嘉泰四年(1204)逝

〔收稿日期〕2014-07-28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招标项目《庐陵史学研究》(编号:JD135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惠运(1962—),男,江西吉安人,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世,卒赠太师,谥文忠。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情。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宣赐宁宗御书“忠文耆德之碑”六字,并诏词臣撰书碑铭。著作有《省斋文稿》、《平园集》等80余种,共200卷。周必大尝建三忠堂于乡,谓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义、胡忠简铨皆庐陵人,周必大平生所敬慕,为文记之,盖绝笔也。后人将周必大与欧阳修、杨邦义、杨万里、胡铨、文天祥合称为“庐陵五忠一节”。

一、刻印《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等文献,保存了珍贵史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周必大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搜求,并用于历史研究。他“平生淡泊无他玩好,惟耽嗜图史,至老不衰。门无杂宾,海内人士有能以片文只字自致于公者,辄忘年忘分与之交际。虽酬酢终日不倦也。”^[4]周必大既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文献家和校勘家。周必大主持刊刻了《文苑英华》和《欧阳文忠公集》等文集,由于编定精审,“遂为善本”,周必大“刻本”历代被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周必大在刊刻《文苑英华》和《欧阳文忠公集》等文集过程中,创制了写题跋、文中小注、篇末校语和卷末校勘记等方法,因此成为精于考据、校勘的史学家,而且为历史研究保存了珍贵文献。

《文苑英华》是北宋四大著名类书(其他三部为《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之一。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李昉、徐铉、扈蒙、宋白编纂的一部上继《昭明文选》,下迄晚唐五代的诗文总集。全书1000卷,选录作家近2200人,作品近2万篇,唐人作品占十分之九,为数代文章之渊薮。由于《文苑英华》编修不精,北宋真宗曾两次对其进行修订与校正。宋孝宗执政期间,孝宗以秘阁本多舛错,曾命周必大再次重校《文苑英华》,这是《文苑英华》在宋代的第三次校勘。由于以往校勘不精,妄加涂注,周必大再请荆湖北路制抚范仲艺、湖北均州通判丁介对《文苑英华》进行了第四次校勘。周必大校刊《文苑英华》时,发现该书存在三点不足:国初文集虽写本,然雠校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指,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凡庙讳未祧,止当阙笔,而校正者于赋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或值押韵,全韵随之,至于唐讳及本朝讳,存改不定,二也;元阙一句或数句,或颇用古语,乃以不知为知,擅自增损,使前代遗文幸存者转增疵类,三也。”^[5]周必大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校刻。

嘉泰元年(1201)至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主持了宋代第五次校勘《文苑英华》的工作,由“士友”胡柯、彭叔夏帮助校勘。《文苑英华》有千卷之巨,内容极为广泛,为了校勘,周必大等人以“实事求是,多闻阙疑”为原则,遍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周必大在序文中记述了校勘《文苑英华》的艰苦过程:惟是元修书时历年颇多,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氏差误,先后颠倒,不可胜计,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参与校勘的彭叔夏将对《文苑英华》一书的考证逐条列出,编成《文苑英华辨证》10卷,亦受到四库馆臣高度评价,称其“用意谨严,不轻点窜”古书。^[6]周必大的这次校勘,成为《文苑英华》编纂以来历次校勘中最精心的一次,其所编纂刊印之成书亦成为历代最好的版本。

《文苑英华》本身就有史料价值,该书制诰部分“多足以考证史事”;“书”、“论”、“碑”、“志”四个部分“可谓考据之渊数,册府之鸿宝也。”^[7]《文苑英华》保存了南朝至唐代的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例如清代官修的《全唐文》中卷穆员卷:“其墓志铭24篇,全部出于《文苑英华》。”^[8]周必大执意要求第四次校勘《文苑英华》的原因,除了以往刊刻不细致,错误太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保存历史文献。他在《〈文苑英华〉序》当中写到:“臣伏睹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诏修三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苑英华》,各一千卷。今二书闽、蜀已刊,《文苑英华》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故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取人。当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近岁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华》而传,况卷帙浩繁,人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则宜。”^[9]因此,为了保存和传播历史文献,周必大再次主持刊刻《文苑英华》这部类书。

周必大通过借他人所藏摹印、朋友馈赠、欧阳修后裔相送等方式搜求欧阳修史料,他在《总跋自刻六一帖》中自述道:“欧阳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某不佞好公之书而无聚之之力,闻有藏其尺牍断稿者,辄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计,则先后莫得而次也。”^[10]绍熙二年(1191),周必大组织友

人、学生一起校勘《欧阳文忠公集》。当时,《欧阳文忠公集》版本虽多,自汴京、江、浙、闽、蜀皆有之,但其集遍行海内而无善本。且由于欧阳修写作时喜欢即时题写在墙壁上,所以易出现朝夕改定以及用字往往不同的现象,从而导致后世传录既广,有些却讹谬不可读。庐陵所刊也存在卷帙丛脞、略无统纪的弊端。为此,周必大久欲订正。绍熙二年(1191)春,周必大和孙谦益等人开始编校欧阳修文集,庆元二年(1196)刻印完成,历时五年多。在编校过程中,他们本着“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原则进行,在校勘《居士集》过程中,他们参校众本,发现有增损其词至百字者,有移易后章为前章者情况,为尊重原文,不改动篇章,而是附注在文下。^[11]周必大不仅多方搜求欧阳修史料,而且为欧阳修真迹作序跋,他写了《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序》、《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和《欧阳文忠公集后序》等,说明校勘始末。在《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迹跋十首》、《题六一先生九帖》、《题六一先生五代史稿》、《跋六一先生诗文稿》等题跋中,说明真迹来历,叙述版本源流。在《题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书稿》、《题六一先生手书后》、《跋欧阳文忠公海学帖》等题跋中,介绍了所题真迹的掌故背景。在《山谷书六一先生古赋》、《总跋自刻六一集》、《题六一先生五代史稿》等题跋中,评价了藏帖内容。在重刊《欧》集过程中,周必大进行了严谨明晰的辨伪。他在《与吕子约寺丞》一文中,周必大谈到朱熹所拥有的欧阳修自传文稿不可信,指出:“考亭(朱熹)间得书……殊可敬叹……(然而)‘修性多病’句良可疑,殊不喜居京亦非六一语”。^[12]在刊刻《欧》集过程当中,周必大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他在《又与孙谦益》信中考证了欧阳修的生日,他写道:“… …乃如《年谱》,皆说六一先生是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丙辰生。前日搜访,得《于役志》一卷,乃是自馆阁贬夷陵时舟行日记,止到公安。其间于六月二十一日说:‘予生日为寿。’寻取《真宗实录》及《长篇》,再三契刻,果是丙辰,乃六月二十一日,已得戊申月节气。然则考诸家考证,容或未详。校书如拂尘,一重过了又一重,非虚语也。”^[13]周必大根据《真宗实录》及《长篇》记载,考证欧阳修生日是6月21日,而不是如《年谱》所说的6月26日。^[14]

我国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在《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考证出周必大用泥活字排版、印刷了自己的著作《玉堂杂记》。以确切的史料填补了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段空白。打破了以前史学界认为活字印刷在北宋毕昇之后元朝王桢之前

无人使用的定论。^[15]周必大在学士院供职期间的随笔记录《玉堂杂记》一书,文献价值应该重视,在南宋学士院典制名物方面的价值,胜过同时代典籍,确为研究南宋官制的珍贵文献。^[16]周必大在《玉堂杂记》序中称此书“凡涉典故及见闻可纪者,辄笔之。”《四库全书》将周必大所著《玉堂杂记》3卷列入史部“职官”类。此书皆记翰林故事,后编入周必大文集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凡銓坡制度沿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纪录,集为此编。所纪如奉表德寿署名、赐安南国王嗣子诏书之类,皆能援引古义,合於典礼。其他琐闻遗事,亦多可资谈柄……得必大此书,互相稽考,南渡后玉堂旧典亦庶几乎釐然具矣。”^[17]

二、创制了一套历史文献考证校勘方法

周必大曾经任职秘书省、国史馆,培养了重视文献和考据的治史能力,“能于考据竭冥搜。”^[18]诗话之体,始自北宋欧阳修,至南宋得以蓬勃发展,周必大是考据类诗话的代表作家,所著《二老堂诗话》是南宋初年考据类诗话的代表作品。周必大重视原碑刻的文献价值,他通过对金石碑刻的考证,补订纸本文献之失,或用不同版本互校旁证,通过字形探取字义,采取多种方式考证,“编摩简册,是正讹舛”。^[19]周必大题跋内容以考证为主,宋代学者楼钥指出,周必大所作题跋:“考古证今,岁月先后,透彻明白,读者叹服。”他的题跋中,考证、校勘等内容占据了重要篇幅。四库馆臣称赞其“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20]近人胡适在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更将周必大与陈垣并提。^[21]无论是校勘文字、考证史实还是辨别评判版本,周必大均下笔客观,立论谨慎,不轻下论断,这与他在主持校勘、刻印《文苑英华》与《欧阳文忠公集》等书籍时强调的“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原则是一致的。

在校勘《文苑英华》一书时,针对“丛脞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氏差误,先后颠倒,不可胜计”等弊病,周必大和彭叔夏等人参看了多种书籍,精心校勘,逐篇详注。周必大在校勘《文苑英华》一书序言中指出,“其间赋多用‘员来’,非读<秦誓正义>安知之‘云’字乃‘员’之省文?以‘尧韭’对‘舜荣’,非读<本草注>,安知其为昌蒲?又如‘切磋’之‘磋’,‘驰驱’之‘驱’,‘挂帆’之‘帆’,‘仙装’之‘装’,<广韵>各有侧音,而流俗改‘切磋’为‘効课’,以‘驻’易‘驱’,以‘席’易‘帆’,以‘仗’易‘装’,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不复遍举。”^[22]周必大刊刻书籍,参用了多种资料,并

以篇末校语形式标注该篇文章所参校的书籍。

周必大《平园集》有《文苑英华跋》，其中详细介绍了此次校勘的全过程：“臣事孝宗皇帝，间闻圣谕，欲刻江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谬不足观，帝乃诏馆职袁集《皇朝文鉴》。臣因及《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皆书生稍习文墨者，月给餐钱，满数岁补武校尉。既得此为课程，往往妄加涂注，缮写装饰，付之秘阁，后世将遂为定本。”^[5]周必大再次组织校勘刻印《文苑英华》一书，校勘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文中小注、篇末校语、卷末校勘记。

我们看到无论是体例编排还是文章去取，周必大都极为慎重，力求客观，决不轻改文献，不做主观判断。他十分强调校勘之前要广泛搜罗异本及相关文献，互相参校，比较异同，有异文则忠实纪录，有疑则存疑，即使编者能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断，亦不轻易删去异文，多将异文注于原文之下，最大程度地避免错讹。^[23]如考证人物姓名之误，柳冕的《青帅乞朝觐表》，文后有卷末校语：《唐书·柳冕传》有此表，《类表》作“柳冕是也”，《英华》误作“李俛”。通过《唐类表》、《唐书》考证出该文中“李俛”当为“柳冕”。^[24]

三、提出并践行“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史学思想

“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是周必大的重要史学思想。庐陵俊士彭叔夏在跟随周必大一同校刊《文苑英华》一书过程中获益匪浅，他深有体会地说：叔夏尝闻太师益国公先生之言曰：校书之法，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乱之源，阙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25]“实事求是，多闻阙疑”这一图书校勘方法成为后世校勘学的典范，备受推崇。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将此法称之为校讎之楷模。近代学者胡适则认为周必大提出的这八字校书法及其图书校勘实践是中国十二世纪校勘复兴的标志之一。

周必大重视正史，不信小说，提倡阙疑求正，避免错讹。他多次提到小说类的文献不可信，说：“小说多妄，其来久矣！”^[26]“小说极难信……有好恶，有差误，秉笔则当决择耳。”^[27]周必大特别重视正史，这当是与他任职史官的经历有关。周必大参与过《四朝国史》（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之史）的编写，熟悉其较为严谨的编写过程，因此十分看重国史。他闲居乡里，为人作序跋时，曾以“前史

官”自名，且常用正史来考索人物生平，同时，不忘将一些见闻写入序跋中，以“所闻备史官采择，以彰圣化。”^[28]在正史与小说的内容发生冲突时，周必大则运用“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原则，以正史对小说的记载进行批驳校正，如他批评小说《邵氏闻见录》，指出：“大抵《邵氏闻见录》颇多荒唐，凡所书人及其岁月鲜不差误，因是略为之辨。”^[29]周必大刊刻《欧阳文忠公集》时，以“诸家本乃当时定本”为标准，选择了未删节本，而将删节本在卷末予以介绍，这种做法也完全符合他“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围绕着范仲淹神道碑版本问题的争论，由于周必大贯彻了“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史学思想，最终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显示出周必大对书籍校勘严肃审慎的态度。周必大精心校勘并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早已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同：“此本（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出，遂成欧集最后定本，其它州郡刻本皆散佚不传。明代所刻欧集诸本，皆出于此本。”^[30]

此外，周必大所著《玉堂杂记》3卷，《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职官”类。此书皆记翰林故事，后编入周必大文集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凡銓坡制度沿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纪录，集为此编。所纪如奉表德寿署名、赐安南国王嗣子诏书之类，皆能援引古义，合於典礼。其他琐闻遗事，亦多可资谈柄……得必大此书，互相稽考，南渡后玉堂旧典亦庶几乎釐然具矣。”^[17]周必大还著有《二老堂诗话》，反映了他历史考证的精神与学识，四库馆臣评价：“是书其论诗之语，凡四十六条。”“必大学问博洽，又熟於掌故，故所论多主於考证。如“王禹偁不知贡举”一条，“刘禹锡淮阴行”一条，“欧阳修诗报班齐”一条，又“陆游说苏轼诗”一条，周紫芝“论金锁甲”一条，司空山“李白诗”一条，杜甫“诗闲殷闾韵”一条，皆极精审。”^[31]

周必大自撰“职官”类史书——《玉堂杂记》，主持刻印《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等文献，保存了珍贵史料；在刻书过程中创制了一套历史文献考证校勘方法；提出并践行“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史学思想。因此，他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参 考 文 献〕

- [1] 陆游. 监丞周公墓志铭[M]//《全宋文》第223册，卷4951，第248页。
- [2] 《先夫人王氏墓志》，《省斋文稿》卷36，第497页。
- [3] 脱脱等撰.《宋史》卷391《周必大传》[M]. 北京：中华书

局,1977.

- [4] 刘弥正.周益公谥诰[M]//《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114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第316页.
- [5] 周必大.《<文苑英华>序》[M]//四库全书:第1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583页.
- [6] 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1342册,第736页.
- [7] 李慈铭著,虞石龙整理,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第四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818.
- [8] 程章灿.《文苑英华》选录碑志文的统计与分析[M]//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六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198.
- [9] 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1147册,第582—583页.
- [10] 周必大.题汪季路所藏书画四轴[M]//《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490页.
- [11] 邹锦良.周必大图书勘刻理论与实践[J].兰台世界,2012,(9).
- [12]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378.
- [13] 周必大.又与孙谦益[M]//《景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第114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118页.
- [14] 谷敏.浅谈周必大重刊《欧阳文忠公集》[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6).
- [15] 黄宽重.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关问题[M]//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 [16] 徐珊珊.周必大《大玉堂杂记》的文献价值[J].天中学刊,2012,(1).
- [17] 转引自汪泰荣编校,《四库全书总目》吉安人著述提要[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10:70.
- [18] 转引自《浅谈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的文献考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1).
- [19] 转引自谷敏:《周必大与<文苑英华>》[J].兰州学刊,2005,(6).
- [20] 纪昀等.文忠集提要[M]//《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1页.
- [21]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M].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22] 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文忠集》卷55[M]//《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第583页.
- [23] 谷敏.周必大与《文苑英华》的校勘[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5).
- [24] 李昉等.青帅乞朝觐表[M]//《文苑英华》卷606,中华书局,1966.
- [25] 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序[M]//《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 [26] 周必大.《王禹偁不知贡举》,《文忠集》卷177.
- [27] 周必大.《吕子约寺丞庆元二年十月》,《文忠集》卷188.
- [28] 周必大.《跋赵逢原得母诗卷》,《文忠集》卷51.
- [29] 周必大.《题吕献可墓志》,《文忠集》卷47.
- [30] 冀淑英.《冀淑英文集》[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51.
- [31]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四库全书》卷195,文渊阁本.

(责任编辑:闫卫平)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Zhou Bida

HUANG Hui-yun

(Luling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Abstract: Zhou Bida is a famous politician, man of letters, historian and carved calligraph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contributions he made in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clude: Saving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engraving literature like “Choice Blossoms from the Garden of Literature” and “A Collection of Master Ouyang Wenzhong”; Creating a set of ways in textual research and collation; And bringing up and practicing the thought of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 Listening much and Being skeptical of what is unknown”. He has an important status and profound influence in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Zhou Bida; Engraving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and Collation;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 Listening much and Being skeptical of What is Unknown”